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

彭树宏*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3 年和 2006 年数据, 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和有序 probit 模型分别考察了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总体回归结果表明, 上山下乡经历能使个体增加 42% 的收入, 但同时会减少 13% 的幸福感; 子样本分析结果表明, 上山下乡经历对收入的正向影响和幸福感的负向影响非常稳健。本文的研究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提供了客观依据, 为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了个性特征维度的新解释, 为新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支持, 为当前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上山下乡 知青 收入 幸福感 伊斯特林悖论

一 引言

知识青年^①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段重要的历史。这场运动发端于上世纪 50 年代, 初澜于上世纪 60 年代, 在文革期间形成高潮, 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结束。从 1962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曾有 1700 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 (刘小萌, 2009)。上山

* 彭树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电子邮箱: pengshuhong@jxufe.edu.cn。本文得到第五十五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技能溢价: 经验事实、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2016 年度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高等教育扩展中的过度教育现象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和 2015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高等教育扩展中的过度教育: 事实特征、理论解释与影响效应”的资助。

① 知识青年, 简称知青, 在本文中特指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年轻人。

下乡运动使得成千上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但同时也使得知青受到严酷的锻炼，在日后社会各领域都涌现出了杰出代表。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人生道路，影响了亿万城镇居民的生活幸福。上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了大量以知青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有不少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潘鸣啸，2005；Xie et al., 2008；Li et al., 2010；金大陆、金光耀，2009；顾洪章，2009；金光耀、金大陆，2015），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这场运动的经济社会后果的文献却极其鲜见。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政治运动，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其发端之时的真实动因却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刘小萌，2009）。对这场运动的客观历史评价离不开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尤其是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展开的定量经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努力普及教育，短短几年时间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49年到1952年底，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已由2349万人增加到5110万人，学龄前儿童入学率达到49.2%；中学在校学生人数由104万人增加到249万人，增长了139%，其中初中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了168%，高中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了26%。由于缺乏计划性，各级教育规模的扩张幅度并不一致，导致各级毕业生比例严重失调。于是，政府在1953年压缩了初中和小学的招生人数，这使得1953年不能升学的人数突然猛增到213.4万人，而后不能升学的毕业生人数逐年上升^①。虽然建国初期，城市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但面对逐年新增的毕业生就业仍然捉襟见肘。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954年，国家开始对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展开大规模改造，使得城镇私营经济急剧萎缩，大大加剧了城市青年就业压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政府开始宣传鼓动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1999年，中国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大学扩招计划，2003年第一届扩招后的本科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自此大学生就业形势逐年严峻。各级政府年年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列为就业工作的首要难题，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其中，面向基层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②。虽然当前大学生去往基层就业并不等同于昔日的

①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② 目前，中央各有关部门主要组织实施了四个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专门项目，包括：团中央、教育部等四部门从2003年起组织实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中组部、原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门从2006年开始组织实施的“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教育部等四部门从2006年开始组织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中组部、教育部等四部门从2008年起组织实施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是两者仍有一些相似之处。从政策动机来讲,都是为了解决过剩的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从个体角度来讲,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始其个人的初次就业。初次就业选择对个体的终身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de Grip et al., 2008; Baert et al., 2013),但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没有研究基层工作经历对中国大学生终身职业发展影响的文献。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能为这一问题提供间接参考,进而帮助评价当前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

知识青年的主体是中学毕业生,他们上山下乡时的平均年龄为18岁^①,刚走出校门就远离城市家人,到偏远艰苦的农村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这对多数知青来讲是挑战和磨练。上山下乡锻炼了知青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坚强韧性的个性品质。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将能力视为先天给定因素,仅关注教育、健康、迁移等形式的人力资本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近年来的劳动经济研究发现,在后天环境中形成的个性特征等非认知技能对个人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有重要影响,并逐渐形成了基于能力的新人力资本理论(Nyhus & Pons, 2005; Almlund et al., 2011; Heckman et al., 2013; 李晓曼、曾湘泉, 2012)。由于个性特征等非认知技能度量困难,数据匮乏,相关研究的进展有限。上山下乡是一段特殊的经历,研究其对知青收入的影响,可以间接研究个性特征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从而为新人力资本理论增添经验证据。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界悬而未决之谜(Easterlin, 2001; Clark et al., 2008; Stevenson & Wolfers, 2013),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还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新的实证解答。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是数据与方法,第三部分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最后是结论。

二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1. 处理效应模型

本文基于扩展明瑟收入方程来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个体收入,核心解释变量是上山下乡经历。上山下乡并非随机选择,而是受家庭背景等因素影响。如果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方法,则会面临内生性问题。所以,本

^①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和2006年数据计算得到。

文采用 Maddala (1983) 提出的处理效应模型来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处理效应模型的回归方程是：

$$y_i = \beta X_i' + \lambda D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D_i 是上山下乡经历虚拟变量， X_i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性别、政治面貌、地区、城市规模、行业类型、单位类型等。

选择方程是：

$$D_i^* = \gamma W_i' + u_i, \quad \text{其中 } D_i = \begin{cases} 1, & \text{如果 } D_i^* > 0 \\ 0, & \text{其他} \end{cases} \quad (2)$$

其中， W_i 是决定是否上山下乡的因素，包含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性别虚拟变量两个变量^①。

式 (1) 和式 (2) 中的 ε 、 u 服从二元正态分布，且均值为 0，协方差矩阵为 $\begin{bmatrix} \sigma^2 & \rho\sigma \\ \rho\sigma & 1 \end{bmatrix}$ ， ρ 为 ε 和 u 的相关系数， σ^2 为 ε 的方差， u 的方差被标准化为 1。

有上山下乡经历与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收入期望值之差为：

$$E(y_i | D_i = 1) - E(y_i | D_i = 0) = \lambda + \rho\sigma \frac{\varphi(\gamma W_i')}{\Phi(\gamma W_i') [1 - \Phi(\gamma W_i')]} \quad (3)$$

φ 、 Φ 分别代表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由式 (3) 可知，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比 OLS 估计结果多了 $\rho\sigma \frac{\varphi(\gamma W_i')}{\Phi(\gamma W_i') [1 - \Phi(\gamma W_i')]}$ 一项。若 $\rho = 0$ ，则不存在内生性，可以使用 OLS 进行估计；若 $\rho \neq 0$ ，则存在内生性，需要用上述的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处理效应模型可以用赫克曼 (heckman) 的两步法进行估计，也可以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两步法的优点是计算方便，缺点是第一步的估计误差被带入第二步中，导致效率损失。所以，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同时估计所有模型参数。

①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除了极少部分人是受革命理想鼓舞自愿下乡外，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是被选择而上山下乡的。在那个年代，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家庭被称为红五类家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类家庭被称为黑五类家庭。黑五类家庭的一个共同可识别特征是父亲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其子女在升学、招工、参军等各方面均普遍受到歧视，他们是最容易、也是最有动力上山下乡的。当时的政策规定，多子女家庭的允许留一个子女在身边。考虑到下乡可能一去不复还，在有儿有女的家庭中，父母更倾向于让女儿上山下乡。所以，我们将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性别作为选择方程 (2) 的解释变量。

2. 有序 probit 模型

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影响时，被解释变量为幸福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对幸福感的测度有“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个选项，分别被赋值“1”、“2”、“3”、“4”、“5”。这五个选项的幸福程度由低到高，有着天然的排序。此时，OLS 方法不适用，需要采用专门的有序 probit 模型来处理。有序 probit 模型是受限因变量模型的一种，是用可观测的有序反应数据建立模型来研究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变化规律的方法。本文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幸福感可视为一种潜变量，其潜变量结构形式如下：

$$h_i^* = \beta X_i' + \lambda D_i + \varepsilon_i \quad (4)$$

式(4)中的 D_i 是上山下乡经历虚拟变量； X_i 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年龄、性别、婚姻、党员、年收入的対数、住房状况、地区、城市规模等； ε_i 为随机误差项。 h_i^* 是个体幸福感的潜变量，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变量，只能采用可观测到的 h_i 和 h_i^* 之间的关系来代表。可观测变量 h_i 和被解释变量 h_i^*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h_i = \begin{cases} 1(\text{非常不幸福}), & \text{如果 } h_i^* \leq r_1 \\ 2(\text{不幸福}), & \text{如果 } r_1 < h_i^* \leq r_2 \\ 3(\text{一般}), & \text{如果 } r_2 < h_i^* \leq r_3 \\ 4(\text{幸福}), & \text{如果 } r_3 < h_i^* \leq r_4 \\ 5(\text{非常幸福}), & \text{如果 } r_4 < h_i^* \leq r_5 \end{cases} \quad (5)$$

h_i 是值域为 {1, 2, 3, 4, 5} 的离散变量，是可观测到的个体 i 的幸福感； $r_1 < r_2 < r_3 < r_4 < r_5$ ，是一组待估计的新参数，这些参数将 h_i^* 划分为 5 个连续区间。假设 $\varepsilon_i \sim N(0, 1)$ ，则：

$$\begin{cases} P(h_i = 1 | X_i) = P(h_i^* \leq r_1) = P(\varepsilon_i \leq r_1 - \beta X_i' | X_i) = \Phi(r_1 - \beta X_i') \\ P(h_i = 2 | X_i) = P(h_i^* \leq r_2) = P(\varepsilon_i \leq r_2 - \beta X_i' | X_i) = \Phi(r_2 - \beta X_i') \\ \dots\dots \\ P(h_i = 5 | X_i) = P(h_i^* \leq r_5) = P(\varepsilon_i \leq r_5 - \beta X_i' | X_i) = \Phi(r_5 - \beta X_i') \end{cases} \quad (6)$$

对数似然函数为：

$$\text{Ln}L = \sum_{i=1}^n \sum_{j=1}^J h_{ij} \text{Ln}[\Phi(r_j - \beta X_i') - \Phi(r_{j-1} - \beta X_i')] \quad (7)$$

通过最大化对数似然函数式(7)，即可估计出有序 probit 模型中的参数 β ，即本文所关心的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影响系数。

(二)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3 年和 2006 年数据。我们只保留有工资收入且出生年份在 1936 - 1966 年之间, 从而有可能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上山下乡的非农就业群体样本^①。去掉少量没有明确回答是否有上山下乡经历、返城时间早于下乡时间等异常样本点, 并将 2003 年和 2006 年数据合并后, 共获得样本量 5633 个, 其中知青样本量 844 个, 非知青样本量 4789 个。在合并后的数据样本中, 原 2006 年数据样本中的收入经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以 2002 年为基期的实际收入^②。本文实证分析所用变量的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上山下乡经历	虚拟变量, 有上山下乡经历者取值为 1, 没有上山下乡经历者取值为 0
收入	个体年收入的対数
幸福感	离散变量, 取值“1”、“2”、“3”、“4”、“5”, 分别对应“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种状态
受教育年限	由个人学历换算而来, 小学或私塾为 6 年, 初中为 9 年, 高中、技校和中专为 12 年, 大专为 15 年, 本科为 16 年, 研究生为 19 年
工作经验	由调查年份减去首职工作年份计算而得
性别	虚拟变量, 女性取值为 1, 男性取值为 0
政治面貌	虚拟变量, 中共党员取值为 1, 非中共党员取值为 0
住房	虚拟变量, 有住房者取值为 1, 无住房者取值为 0

① 1955 年, 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 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情。1978 年,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基于此, 我们将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止时间确立为 1955 - 1978 年。当时的小学学制为 5 ~ 6 年, 中学学制为 4 ~ 6 年, 以小学入学年龄 7 岁计, 1955 年下乡的最大龄者的出生年份应为 $1955 - (7 + 6 + 6) = 1936$ 年, 1978 年下乡的最小龄者的出生年份应为 $1978 - (7 + 5) = 1966$ 。

② 2003 年和 2006 年 CGSS 数据中的年收入分别是个体 2002 年和 2005 年的全年收入。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地区	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类,以西部为基准组,分设东部、中部和东北三个虚拟变量 ^①
城市规模	划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三类,大城市包括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市区,中等城市指各地级市市区,以小城市为基准组,分设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两个虚拟变量
行业类型	虚拟变量,第二产业取值为1,第三产业取值为0
单位类型	虚拟变量,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取值为1,企业取值为0
父亲受教育年限	由父亲学历换算而来,小学或私塾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技校和中专为12年,大专为15年,本科为16年,研究生为19年

资料来源:根据 CGSS 数据整理得到。

三 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到,知青群体的年收入要高于非知青群体,而幸福感则正好相反。这个初步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给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知青群体的收入较高?上山下乡经历是否影响了知青的个体收入?为什么收入高的知青群体的幸福感反而更低?上山下乡经历是否对知青群体的幸福感产生了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收入和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而知青群体与非知青群体在这些因素上是存在差异的。表2列明了这些差异,可以看到,在个体受教育年限、女性比例、非党员比例、大城市比例和父亲受教育年限五个变量上,知青群体要明显高于非知青群体。所以,要回答上述问题,则必须采用更严格的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分离出上山下乡经历的影响。

① 东部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6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12省(区、市)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3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参考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zs/cjwtd/201308/t20130829_74318.html。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非知青	知青	总体
年收入(元)	10897.730 (11870.050)	11283.840 (10103.200)	10955.640 (11622.180)
幸福感	3.334 (0.773)	3.280 (0.757)	3.326 (0.771)
受教育年限(年)	9.787 (3.209)	10.570 (2.744)	9.907 (3.155)
工作经验(年)	31.305 (10.317)	30.870 (6.331)	31.240 (9.823)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	4.726 (4.348)	6.197 (4.507)	4.951 (4.404)
婚姻(%)			
已婚	90.4	90.8	90.5
未婚	9.6	9.2	9.5
性别(%)			
女性	47.8	54.4	48.8
男性	52.2	45.6	51.2
政治面貌(%)			
党员	21.2	19.6	20.9
非党员	78.8	80.4	79.1
住房(%)			
有	80.5	82.2	80.7
无	19.5	17.8	19.3
地区(%)			
东部	44.6	48.3	45.1
中部	22.8	19.4	22.3
东北	10.5	13.0	10.9
西部	22.1	19.3	21.7
城市(%)			
大城市	39.0	51.5	40.9

续表

变量名称	非知青	知青	总体
中等城市	24.7	25.9	24.9
小城市	36.3	22.6	34.2
产业(%)			
第二产业	48.4	51.4	48.9
第三产业	51.6	48.6	51.1
单位类型(%)			
公共部门	21.6	21.1	21.5
非公共部门	78.4	78.9	78.5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根据 CGSS 数据计算得到。

(二)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

1. 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由于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处理效应模型来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表3列出了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上面部分是主方程回归结果，下面部分是选择方程回归结果。两方程随机误差项的相关系数 ρ 小于零，且非常显著。这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变量的确存在较严重的内生性选择偏差问题，若采用OLS估计，则会严重低估上山下乡经历的影响，验证了采用处理效应模型的必要性。选择方程的回归结果表明，是否为女性和父亲受教育年限对上山下乡的概率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模型设定，说明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有更大的概率被选定为上山下乡的对象，多子女家庭中的父母更倾向于让女儿上山下乡而将儿子留城。

从主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影响效应达到42%。控制变量中，表征人力资本的教育变量的影响显著，但回报率只有5.9%，工作经验变量则不显著，人力资本的作用有限^①；性别和政治面貌的影响显著，

① 这样的结果与本文选取的样本有关。为了加强可比性，本文只选取出生年份在1936-1966年之间，从而有可能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上山下乡的个体样本。这个群体的年龄相对集中，工作经验差异不大；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使得特定工作的经验对收入提升的作用有限；文革期间的教育中断使得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0年，而且还有不少的工农兵大学生。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收入要低 25.7%，党员比非党员收入要高 15.9%；地区、城市规模、行业 and 单位类型的影响都很显著，东部地区、大城市、第三产业、公共部门的收入更高，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表现。

表 3 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处理效应模型）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主方程回归因变量：年收入的対数		
上山下乡	0.422 ***	0.070
受教育年限	0.059 ***	0.004
工作经验	0.002	0.006
工作经验平方	0.000	0.000
女性	-0.257 ***	0.023
党员	0.159 ***	0.024
东部地区	0.293 ***	0.030
中部地区	-0.033	0.034
东北地区	-0.314 ***	0.040
大城市	0.221 ***	0.028
中等城市	0.121 ***	0.030
第二产业	-0.119 ***	0.024
公共部门	0.267 ***	0.027
常数项	8.126 ***	0.108
选择方程回归因变量：是否上山下乡		
女性	0.173 ***	0.046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40 ***	0.005
常数项	-1.285 ***	0.042
ρ	-0.326 ***	0.047
样本量	4426	

注：*、**、***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CGSS 数据计算得到。

2. 子样本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影响的异质性和稳健性，我们从各个不同维度分子样本进行回归。从表 4 可以看到，除了地区维度中的东北和西部地区子样本外，其他

子样本中，上山下乡经历对收入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 ρ 小于零且统计显著。这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正向影响十分稳健。从系数大小的比较来看，上山下乡经历对女性、党员、东部地区、中等城市、第三产业和非公共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有更大的影响。

(三)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影响

1. 总体回归结果

表 5 是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幸福感比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非知青幸福感要低 13%。

表 5 总体回归结果 (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影响: 有序 probit 模型)

因变量: 幸福感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上山下乡	-0.126 ***	0.042
受教育年限	0.015 ***	0.006
年龄	0.011 ***	0.002
女性	0.290 ***	0.032
已婚	0.517 ***	0.054
党员	0.181 ***	0.039
年收入的対数	0.344 ***	0.021
住房	0.279 ***	0.040
东部地区	-0.093 **	0.042
中部地区	-0.072	0.048
东北地区	-0.082	0.060
大城市	-0.187 ***	0.039
中等城市	-0.092 **	0.041
样本量	5348	

注: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CGSS 数据计算得到。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受教育年限和年龄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前面收入效应的结果类似，这也可能是由于本文的样本群体的年龄段集中、受教育程度普

遍较低所致。女性、已婚和党员的幸福感更高，特别是婚姻对个体幸福感有非常大的影响。收入和住房对幸福感的影响也较大，这表明经济基础是幸福感的重要源泉。东部地区的幸福感显著更低，其他地区的幸福感则没有显著差异；城市规模越大，幸福感越低。

2. 子样本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和稳健性，我们从各个不同维度分子样本进行回归。从表6可以看到，除了一些没有显著影响的子样本外，其他子样本中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个体幸福感都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很稳健。从系数大小的比较来看，上山下乡经历对男性、已婚、非党员、有住房、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劳动者的幸福感有更大的负向影响。

四 结论

本文采用CGSS 2003年和2006年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总体回归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能使个体增加42%的收入，但同时会减少13%的幸福感；子样本分析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收入的正向影响和幸福感的负向影响非常稳健。从系数大小的比较来看，上山下乡经历对女性、党员、东部地区、中等城市、第三产业和非公共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有更大的贡献；对男性、已婚、非党员、有住房、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劳动者的幸福感有更大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方面的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要理性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并正确看待当前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虽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得大批青年人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在校受教育机会，造成“人才断层”，给个体、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痛的灾难，但是这一运动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脱离建国初期无序扩缩的教育政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以及“文革”等特定历史背景来单独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下，即使知识青年不上山下乡，待在城市也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上山下乡虽然艰苦，但也能磨练青年人的意志品质和环境适应能力，形成坚强韧性的个性特征，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高回报。当前面向基层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是有价值的，但是要注意两点：第一，要让大学生自行比较下基层的收益和

机会成本来做出选择,充分遵从大学生的个人意愿来推行政策;第二,要破除人才流动的制度障碍,既要让大学生愿意下到基层去,同时也要使在基层的大学生能流动出来。

第二,个性特征是影响收入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上山下乡经历提高个体收入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后天环境中形成的个性特征对个人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有重要影响,这是对新人力资本理论的经验证据支持。Easterlin(1974)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水平高于穷人;但若进行跨国比较,则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伊斯特林悖论表明了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个体和群体层面上存在差异。现有文献一般从相对收入理论和忽略变量理论两个方面对伊斯特林悖论进行解释。前者认为个人幸福感与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收入正相关。后者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些如环境、不平等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幸福感,当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就会出现伊斯特林悖论现象。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作一个特殊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有着较高收入的知青却有着较低的幸福感。上山下乡的艰苦经历培育了知青坚强韧性的心理品质,但同时也留下了苦难的生活回忆。这种个性特征正是知青高收入低幸福感的原因。对伊斯特林悖论的个性特征解释可以看作忽略变量理论中的一个新的忽略变量,其对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有待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顾洪章(200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 金大陆、金光耀(200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金光耀、金大陆(2015),《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第112-122页。
- 李晓曼、曾湘泉(2012),《新人力资本理论——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动态》,《经济学动态》第11期,第120-126页。
- 刘小萌(2009),《中国知青史——大潮》,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 潘鸣啸(2005),《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154-181页。
- Almlund, Mathilde, Angela Lee Duckworth, James Heckman & Tim Kautz(2011). Personality

-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In Eric Hanushek, Stephen Machin & Ludger Woessmann (ed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Volume 4*.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p. 1 – 181.
- Baert, Stijn, Bart Cockx & Dieter Verhaest (2013). Overeducation at the Start of the Career: Stepping Stone or Trap? *Labour Economics*, 25, 123 – 140.
- Clark, Andrew, Paul Frijters & Michael Shields (2008).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1), 95 – 144.
- de Grip, Andries, Hans Bosma, Dick Willems & Martin van Boxtel (2008). Job-worker Mismatch and Cognitive Declin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0(2), 237 – 253.
- Easterlin, Richard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89, 89 – 125.
- Easterlin, Richard (2001).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473), 465 – 484.
- Heckman, James, Rodrigo Pinto & Peter Savelyev (2013).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n Influential Early Childhood Program Boosted Adult Outco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052 – 2086.
- Li, Hongbin, Mark Rosenzweig & Junsen Zhang (2010). Altruism, Favoritism, and Guilt in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Sophie's Choice in Mao's Mass Send-Down Move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8(1), 1 – 38.
- Maddala, Gangadharrao (1983). *Limited-dependent and Qualitative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yhus, Ellen & Empar Pons (2005). The Effects of Personality on Earn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6(3), 363 – 384.
- Stevenson, Betsey & Justin Wolfers (2013).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come: Is There Any Evidence of Sati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 598 – 604.
- Xie, Yu, Yang Jiang & Emily Greenman (2008). Did Send-down Experience Benefit Youth? A Reevaluation of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Forced Urban-rural Migration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2), 686 – 700.

The Impact of Sent-Down Experience on Educated Youths' Income and Happiness

Peng Shuhong^{1,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¹;
School of Statist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²)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treatment effect model and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ent-down experience on educated youths' income and happiness by using data from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03 and 2006. The overall 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sent-down experience increases individuals' income by 42 perc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reduces individuals' happiness by 13 percent. Sub-sampl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sent-down experience on income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ent-down experience on happiness are very robust. This study provides objective evidence for the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sent-down movement, new interpret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from the view of personality perspective, new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new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useful inspiration for the current sent-down policy of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Keywords: sent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educated youth, income, happiness, Easterlin paradox

JEL Classification: J24, J61

(责任编辑: 西 贝)